

在二十世纪中后叶德国的思想群体法兰克福学派那里，我们可以看到一种超越庸常生活的努力。无论是本雅明还是马尔库塞，都表现出了在批判庸常生活方面的非凡雄辩与绝世才华；而这一切的得来，大概是超越的努力的结果。

广西有一位近故的思者龙子仲先生，他说，超越的目的，通常还是为了回到生活里来。诚然，唯有委身于生活的广袤江湖里，思考与批判才不至于轻浮和虚空——然而，超越又缘何而起呢？纽约大学教授张旭东先生这样形容本雅明：“从‘资产阶级世纪’中苏醒。”把本雅明写作的时间现场简单地界定在资本主义时代，显然说明不了他的丰富、宽广与复杂，但“苏醒”一词用得却很是妥当、精辟。我窃以为，它也回答了我们的提问，即为那个所谓的超越做出了前提准备。

这个专题取名为“从设计里苏醒”，想讨论的是城市建筑设计和所有与之相关的所有人或事物。它最终想追问的是这样一些问题：设计是什么？今天的那些个在做设计的人们对于我们的城市和生活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在今日中国，要回答这些就要先面对这样一个现实问题：怎么界定这群“做设计的人”？建筑师？城市规划师？城市设计师？建筑学校的象牙塔里挤兑出来的这些个寒酸的职业名词，已经不足以解释城市建设一线上玄机重重的人事政治现场了。我们都知道，在大多数城市的大多数项目里，主宰设计的大多是那些手持金元和大棒的资本家、权贵。

这种喧宾夺主的闹剧，说明了设计在城市建设中的长久缺位。悖谬的是，这一缺位却造成了另一种迷信心理——我们暂且把它称为设计崇拜。和其他所谓文明的标志（科学、制度、管理、规划……）一样，设计被标识为万能的东西；更甚的是，设计的本质被剥离或忽略不计，直接化身为宗教式的图腾符号，成为众相争夺的对象——早几年被热捧的明星建筑便是明证。毋庸置疑，对于我们的未来来说，这个问题更值得我们深思和反省。

然而这并非易事，因为要反思设计，实际上无异于反思文明本身。

这个专题要献给一些人。首先是为日日夜夜奋战在建筑/城市设计第一线的普通中国建筑师们，迫于现实，在金元和大棒的威逼利诱下，他们的灵感与激情消耗在无数次的妥协、斡旋甚或与同行的钩心斗角中；他们绞尽脑汁，呕心沥血，只为画出一张“让领导满意让业主满意”的图纸来……其次，我们也要献给中国的六亿城市公民，他们生活在城市里，一直在过着被一种似是而非、荒腔走板的设计设计着的生活……

在2012年新年之际，我们将“从设计里苏醒”当作一句出发的口号，送给他们，也送给我们自己。无论如何，设计仍须继续——从设计里苏醒，是为超越于设计；超越不在于脱离而去，它的终极目的是为了要重新回到设计里去。（黄忠免）

✓





策划 :: 本刊编辑部 黄忠免





# 生活在被设计的城市里

*Living in Planned Cities*

文：师永涛

→ 师永涛，作家，媒体策划人。曾经在桂林、西安、杭州工作，关注历史与城市。

在过去的十年中，我生活了中国的四个城市：桂林、西安、南宁和杭州。和每一个城市中的大多数人一样，我天天穿梭在城市洪大的人流里，赶公共汽车，然后在菜市场 and 电脑旁边度过我的日子。

直到有一天，我忽然问自己：这是谁的城市？我们的城市为何是这个样子的？

作为城市中的普通人，城市是我生活和工作展开的场所，一年四季中，除了旅行和出差，我基本都生活在这个城市里。即便是在这个城市中生活了几十年的人，可能也说不清楚这个城市的细节，他往往只对自己生活的片区熟悉，离开这个区域，他的城市经验并不比外来人占更多优势。

这是谁的城市？这已经不是一道选择题，而是一道判断题，城市从来没有试图适合大多数人的意愿。一位建筑师朋友告诉我，国际建筑学界有句名言：“城市建筑是长官、开发商、建筑师和市民合谋的产物。”这句话或许可以推而广之，适用于城市的规划、建设和管理等各个环节。毫无疑问，这种“合谋”其实是一种多方利益的博弈与制衡，而我们的城市，就是合谋的产物。

因此，中国的城市实际上是一个面目模糊的名词。



在今天，随着中国经济的强劲发展，城市之间开始相互观摩、取经、效仿和攀比，中国城市数量的增加与规模扩张，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但是当我们游走在城市之间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哪个城市可能获得如当年梁思成对老北京城的评价——“这是一座独一无二的城市”。《新周刊》曾做过一期“绝版中国”的策划，其中有这样的几句：“中国城市面貌‘一年一小变，三年一大变’，保护变成了重建，我们渐渐找不到中华文明存活过的完整证据。几代人在毁城灭迹，并令每一座城市都成了受伤的城市。”

越来越多的人发现了中国城市越来越相像：一样标志风格的连锁快餐店、银行网点、五星级酒店；一样的马赛克、玻璃幕墙；一样港式、欧风、新加坡模式的中不中、洋不洋的建筑。建筑大师贝聿铭曾这样评论中国的建筑师：“他们尝试过苏联的方式，结果他们对那些按苏联方式建造的建筑物深恶痛绝。现在他们试图采纳西方的方式，我担心他们最终同样会讨厌他们的建筑。”

现在，每个城市都在大力兴建广场和标志性建筑，为自己代言。标志性建筑的内涵应是城市历史文化的积淀，反映出城市固有的个性风貌，可以存在数百年而不改。

可惜绝大多数城市的标志性建筑并不能成为其历史文化的载体，或者说它只是把城市固有的文化消灭之后以新建筑取而代之。以最新最高最现代的建筑作为城市的标志性建筑，是目前中国城市建筑景观热中的一大误区。新建筑之后还有更新的，因而标志性建筑也总在易帜。

比如，中国几乎所有城市都是上世纪90年代看国贸，21世纪看地王。一切都以时序和建筑的宏伟来定。人说标志性建筑是城市的眼睛，我们的城市太像一个急于追逐所谓的时尚而不惜一再动刀整容的小姑娘。中国有数万座50层以上的大厦，数千条的步行街，数百个CBD(中央商务区)，每个城市都建有广场和地标建筑，这些基本上是城市管理者们互相观摩、取经、效仿和攀比的结果。他们需要不落伍，但付出的是“相似”的代价。在中国建筑界盛传着这样的故事：某些建筑设计师到处竞标，不过是把自己在一个城市的建筑方案略作规模上的调整拿到另一个城市套用。

于是，中国的城市消失了，广州、上海、杭州……被“中国的西雅图、中国的伦敦、中国的班加罗尔……”等各色外国城市所取代。我们穷尽几代人的智慧所建造的城市，只是为了更像另外的城市。

城市，相当程度上决定了一个城市人的生活半径、轨迹和方式，倘使你一辈子生活在城市里，那么，你的生活实际上已经被“规划”好了：去哪里办事、去哪里购物、以何种方式出行。而且，你的身份或许也已经被规划得很清晰：你买的房子越靠近市中心，证明你越富有。

我们城市的天际线以前是以自然为标记，在西安，城市天际线是秦岭；在杭州，是西湖边的群山；在桂林，则是那些以独秀峰为中心的众多秀丽的独山。但今天，城市的天际线取决于规划——建筑的高度，那些“错落有致”的商品房小区成了天际线的主要构成部分。但实际上，大多数时候，我们需要在狭窄的楼间距中仰望，才能够看到天空，遑论天际线。

我们的生活，也要依赖规划。如果你住在规划中的新城或新区，那么，祝贺你，可能三五年内你不得不接受没有直达公交车，没有便利超市，没有菜场的生生活。我们所生活的城市在不断生长，但这种生长是以建筑的生长来衡量。所谓的造城，并不是以城市中人的生活为准则的，而是以城市扩张的边界为准则。

很多人愿意去巴黎、伦敦或布拉格的街头散步，而不是在国内的城市街道游走，除非他一定是个魔幻现实主义爱好者：在行人和自行车的催促下、成排楼宇的压迫前、汽车的轰鸣声中，街道散步如同受难，再美好的初衷都会变得烦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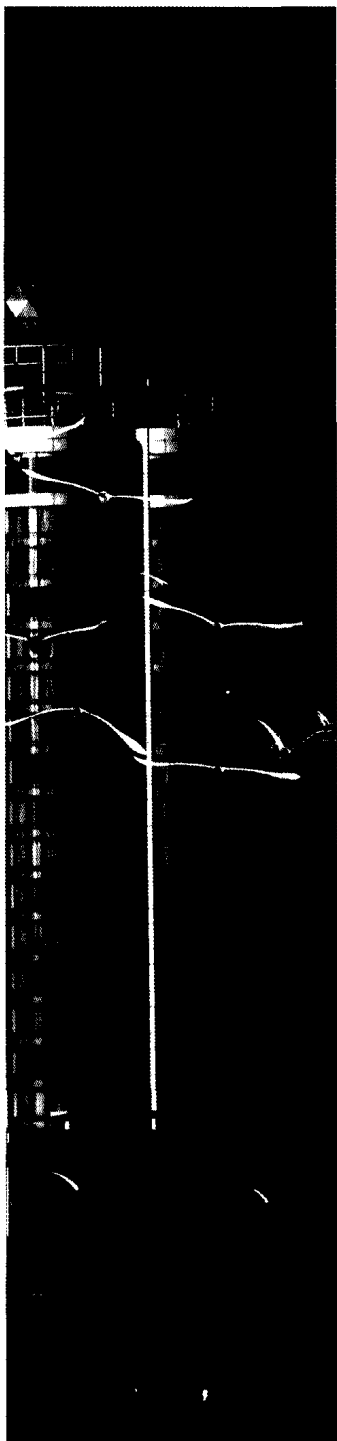
城市，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只是谋生的地方，而没有了生活的情趣。建筑只是为了装更多的人，街道只是为了让更多的汽车去奔跑。扭七扭八的盲道、窄窄的仅容一人过的人行道、大量的山寨白宫……我们的建筑和城市，仅仅连常识性的性能都达不到，更遑论人性化和艺术化。

更为现实的是，我们的城市并没有好的运行机制，或者说，中国的城市有着很强的排他性。

从2000年—2005年的5年间，共有160万人口从美国大都市迁居到小城市工作生活。他们迁居的理由大多是因为小城市治安稳定、交通方便、房价低，并且能在清新的空气中休闲娱乐。另外，很多有了孩子的夫妇都认为在小城市生活更加有利于孩子的成长。

在中国，近几年也有着“逃离北上广”的人群出现，显然，中国大都市白领阶层的被迫逃离与美国白领的迁居有本质的区别。在中国，城市外来人口的户籍问题形成了很大的障碍，在一线城市工作，如果你没有当地户籍，读书、就业、购房、养老、医疗等等问题都很难解决。

城市，始终是他处的话题。



台湾学者喻肇青在《都市设计的危机与定位》中指出“变”是城市设计的重要特点之一，他要求城市设计师把时间作为一项重要的设计影响因素，通过动态反馈过程不断调整设计与实施策略，以更好地推进项目进程，顺应城市建设。

但实际的情况是，我们的城市缔造者会先画一个蓝图，然后不遗余力地把这个图搬到大地，时间，对于一个城市来说，只是十几年的概念，或者说，是70年这样一个具体的数字——城市的塑造依赖于地产，而大多数城市社区的产权为70年。

迪赛（C. M. Deasy）在《为人的设计》一书中指出“规划和设计的目的不是创造一个有形的工艺品，而是创造一个满足人类行为的环境”。城市空间的服务对象是群体而非个人，因此城市设计师应关注群体的行为特征与行为需求。那么，是不是就意味着城市可以被规划，而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只需要按照规划去规划自己的生活呢？

当然不是这样，实际上，对群体行为特征的研究一般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为对公众行为规律的观察与归纳，是针对不同城市空间、不同人群的行为特征的研究，与城市空间类型、人的生活习惯、心理特征与社会准则、伦理道德有关，属于群体需求的共性研究；另一部分则是对特定的活动、集会的关注，包括节庆、民俗活动与各种有组织的活动，它们更多地与城市的历史、民族的文化、习俗相关，是群体需求的个性研究。

没有了人味的城市，只能是冰冷的建筑；没有了个性的城市，只能是冰冷建筑的堆砌；没有了文化的城市，只能是他乡而非故乡。所以，在这个层面上来说，我们的“被规划”的城市，其实最需要规划——基于生活和文化的规划，基于艺术的建筑设计。

书评人梁永安曾经讲到，根据专家的调查结果，北京最繁华的商业区之一——大栅栏已经开始呈现典型的贫民区景象，人均日消费8元，三口之家挤在不到5平方米的房间里。而在房间外面，则是这一地区寸土寸金的现实——守着个金娃娃，为什么这里的人们会陷入贫困？大栅栏的人们当然并不比任何其他地方的居民来得笨一点，他们贫困是因为他们没有选择自己生活的权利——整个城市生活已经规划好了，留给个人发展的空间已经不多。

“今天，我们所看到那种简单化、一刀切、不通人情的所谓的城市规划和城市设计就是一种典型的城市‘建设停滞’现象。”雅各布斯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中一再证明，规划得越整齐的街区最后越没有生气，而那些由着人们自己去弄的所谓贫民区，最后倒成了最安全、最有生气的地方。其中的原因无他，只不过是笨拙的规划在这里使不上力气而已。今天，我们所生活的城市，何尝不是如此？

“

这是谁的城市？这已经不是一道选择题，而是一道判断题，城市从来没有试图适合大多数人的意愿。一位建筑师朋友告诉我，国际建筑学界有句名言：“城市建筑是长官、开发商、建筑师和市民合谋的产物。”这句话或许可以推而广之，适用于城市的规划、建设和管理等各个环节。毫无疑问，这种“合谋”其实是一种多方利益的博弈与制衡，而我们的城市，就是合谋的产物。

”